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 关键词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永续发展”

□ 吴耀明

永续发展是指在满足当代人发展需要的同时，不损害后代人需要的发展，确保顾及长远、世代公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永续发展”的重要论述，深刻总结了人类文明发展规律，体现了广阔的历史视野和强烈的责任担当。深入学习这些重要论述，有助于广大党员干部增强战略性、系统性、前瞻性，为确保中华民族世代相承和中华文明薪火相传提供了思想指引和根本遵循。

2012年11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八届一中全会上强调，我们要继续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到现代化建设全局的突出地位，把生态文明理念深刻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从根本上扭转生态环境恶化趋势，确保中华民族永续发展，为全球生态安全作出我们应有的贡献。2017年10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强调，建设生态文明是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2018年5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强调，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2022年10月1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我们坚持可持续发展，坚持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的方针，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自然和生态环境，坚定不移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良好生态环境是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内在要求。生态环境保护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事业。我们必须站在

全局、整体和长远的高度来谋划经济社会发展，决不能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换取一时的经济增长，决不能吃祖宗饭、断子孙路，用破坏性方式搞发展。要把生态文明建设作为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的长远大计，为子孙后代留下天蓝、地绿、水清的美丽家园。

2014年3月1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五次会议上强调，全党要大力增强忧患意识、水危机意识，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战略高度，重视解决好水安全问题。水是生命之源、生产之要、生态之基。水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内容，水危机是生存环境之危、民族存续之危。必须系统推进水污染防治、水生态保护和水资源管理，大力推进节水型社会建设，确保水资源可持续利用和水环境改善，全面提升国家水安全保障能力，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更坚实的水安全保障，为子孙后代留下生存发展的资源和空间。

2019年4月3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大会上强调，中国共产党立志于中华民族千秋伟业，必须始终代表广大青年、赢得广大青年、依靠广大青年，用极大力量做好青年工作，确保党的事业薪火相传，确保中华民族永续发展。青年是最积极、最有生气的力量，是决定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生力军。我们党始终重视青年、关怀青年、信任青年，对青年寄予殷切期望。新时代新征程，广大青年必须坚定信念、真诚奉献、埋头苦干，坚定不移听党话、

跟党走，努力成长为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为确保中华民族永续发展提供人才保障。

2019年8月2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甘肃省兰州市黄河治理兰铁泵站项目点考察时强调，黄河、长江都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保护母亲河是事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永续发展的千秋大计。9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省郑州市主持召开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时强调，保护黄河是事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永续发展的千秋大计。2021年3月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青海代表团审议时强调，青海对国家生态安全、民族永续发展负有重大责任，必须承担好维护生态安全、保护三江源、保护“中华水塔”的重大使命，对国家、对民族、对子孙后代负责。黄河、长江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是中华文明的摇篮，也是中华民族发展的重要支撑。三江源是我国重要的淡水供给地，是国家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在维护国家生态安全中具有无可替代的战略地位。保护好黄河、长江和三江源对中华民族发展至关重要。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战略，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重大国家战略，也是让中华民族永葆活力的重大举措。守好长江一江清水、确保黄河安澜、保护“中华水塔”，既是守护好国家的生命之源和中华文明摇篮，又是留下惠泽子孙万代的幸福河，实现中华儿女的千年期盼。

2021年9月2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三次

集体学习时强调，生物安全关乎人民生命健康，关乎国家长治久安，关乎中华民族永续发展，是国家总体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影响乃至重塑世界格局的重要力量。生物安全问题已成为全人类面临的最紧迫和最突出的安全问题之一，生物安全风险对人民生命健康、农业生产、生物多样性等造成严重威胁和挑战。我们必须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生物安全法》，加强国家生物安全风险防控和治理体系建设，提高国家生物安全治理能力，切实筑牢国家生物安全屏障，确保把生物安全、生命安全的钥匙牢牢握在自己手中。

2022年3月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全国政协十三届五次会议的农业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时强调，耕地是粮食生产的命根子，是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基。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是治国理政的头等大事。民以食为天，食以土为本。耕地是粮食生产的基本载体，是粮食生产最重要的自然资源基础。对我们这样一个人口大国、农业大国来说，18亿亩耕地红线绝不是一件可有可无的事情，也不是一个要权衡守得住与守不住的问题，而是一个必须不折不扣贯彻落实的“生命线”和“安全线”。我们必须站在历史和全局高度，坚持实行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坚决守住耕地保护红线和粮食安全底线，坚决遏制耕地“非农化”、基本农田“非粮化”，确保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里，做到手中有粮、心中不慌。

中国式现代化的守正之道

□ 张琳 侯 灿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树立守正创新意识，保持现代化进程的持续性。面对现代化进程中遇到的各种新问题新情况新挑战，政党要敢于担当、勇于作为，冲破思想观念束缚，破除体制机制弊端，探索优化方法路径，不断实现理论和实践上的创新突破，为现代化进程注入源源不断的强大活力。”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勇于创新，也坚持守正，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而是恪守现代化的正道，有着自己坚守的原则和底线。中国式现代化的守正之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之一。我国是典型的后发现代化国家，相比先发现代化国家，后发国家丧失了发展先机，要实现现代化就需要一个强有力的领导核心，以追赶世界发展的潮流。具体到中国，是中国共产党承担了这一重任，成为中国现代化事业的设计者和推动者。中国共产党承担民族复兴的历史使命，把握中国现代化的前进方向，提出具体的发展方案，以中国式现代化不断推动民族复兴。在中国共产党的百年探索中，中国式现代化道路逐渐成熟，用几十年时间走完西方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在巨大的人口规模之上，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创造了人类现代化历史上的奇迹。中国现代化事业成就斐然，但也存在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发展过程中面临复杂的矛盾和风险，需要中国共产党这一强有力的

领导集体运筹帷幄、统筹兼顾，应对发展中的各种问题，成为全国人民的定心骨，不断推动中国现代化事业向前发展。

始终保有鲜明的社会主义特色。中国式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社会主义决定了我国现代化的性质和方向。独特的历史境遇下，让中国人民选择了社会主义的现代化道路。资本主义道路在中国走不通，只有社会主义道路才能让中国从积贫积弱的状态中解放出来。中国式现代化的社会主义性质，决定了如下特点：首先，中国式现代化始终坚定人民立场，着力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防止两极分化。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中国式现代化的社会主义性质决定了我们的现代化必须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为此必须大力发展生产力，消除贫困、改善民生，把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现代化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大力维护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坚决防止两极分化。其次，中国式现代化坚持社会主义发展方向，以共产主义理想为最终目标，这决定着中国式现代化有着更高层次的追求，是对资本主义发展模式超越。社会主义的胜利具有历史必然性，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意义不仅体现在实现本国的现代化，更是为人类进入更高层次的社会形态作出探索。最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成功，证明资本主义不是实现现代化的唯一模式，通过社会主义仍旧可以走上现代化的康庄大道，打破了西方

现代化的唯一性，为其他后发国家的现代化提供了参照。

始终坚持现代化的基本方向。现代化是人类社会从工业革命以来所经历的一场急剧性变革和潮流，它以工业化为推动力，实现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全球性和全方位的大转变，具有经济领域的工业化、政治领域的民主化、社会领域的城镇化和思想观念领域的理性化等特征，其实现过程具有长期性与复杂性、系统性与多样性、连续性与阶段性、前进性与曲折性相统一的特点。尽管各国的现代化实现程度和表现样态各异，但以上特征和特点既是各国步入现代化无法回避的内在规定，也是各国实现现代化所要遵循的规律。中国式现代化恪守这一内在规定，坚持普遍性和特殊性相统一。一方面，高举现代化大旗，顺应世界历史潮流，积极推动实现传统社会的现代转型。另一方面，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方面不断探索和改革，明确了“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提出了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彰显了中国共产党对“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一重大战略问题的自觉思考和科学回应，实现了对现代化理论与实践的传承与创新。

与西方现代化模式根本不同的是，中国式现代化不是以资本为主导和中心，而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如何在发展过程中，科学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将现代化成果惠及广大人民，成为中国式

现代化不可回避的重要问题。中国式现代化正是在直面现代化过程中的问题与矛盾，在坚持现代化发展一般规律、高举现代化大旗的同时又解决中国现代化面临的独特矛盾和问题，从而形成了具有时代特色的新道路，使其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

始终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为目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坚持人的全面发展是现代化的最终目的，并非单纯追求经济利益。现代社会之所以能取代传统社会，不单是因为现代化带来了生产力的巨大的进步，也在于现代化过程中极大地促进了人的解放。西方国家通过资本主义，最早实现了现代化，成为现代化先驱，也最早享受了现代化的成果。但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资本主导的现代化已将一切关系转变为金钱关系，人成为金钱的奴隶，受制于整体资本主导的社会体系。中国式现代化以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不仅要实现物质文明的发展，还要将发展成果惠及人民，最终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注重解放发展生产力，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同时坚持共同富裕，将现代化的成果惠及人民，注重人民的美好生活。人民的美好生活，不仅要有充足的物质基础，还要有丰富的精神世界，有良好的生态环境，要求社会整体的发展和进步。这也就是中国式现代化是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的协调发展，不是资本主义单纯追求物质财富的单一型现代化。

“交往”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范畴，贯穿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形成、发展和完善的各个时期。马克思主义是如何理解“交往”的呢？

首先，交往是一个表征主体间交互性的关系范畴。在1846年12月28日致安年柯夫的信中，马克思谈道：“我在这里使用‘commerce’一词是就它的最广泛的意义而言，就像在德文中使用‘Verkehr’一词那样。例如：各种特权、行会和公会的制度、中世纪的全部规则，曾是唯一适应于既得的生产力和产生这些制度的先前存在的社会状况的社会关系……而随着生产方式的改变，他们便改变所有不过是这一特定生产方式的必然关系的经济关系。”马克思这里所指的“交往”，指向的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各种关系。从根本上说，交往实质上是人与人之间的“交互作用”，是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交流、相互沟通、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是“主体间”的互动。人们之间互动的一定形式，即交往形式，马克思也称为“交往方式”；人们通过一定的方式进行交往，就形成一定的交往关系，如经济关系、政治关系和思想关系等社会关系。交往关系形成后，又反过来规定着人们的交往方式。物质交往产生的是“特定生产方式的必然关系的经济关系”。生产关系作为经济关系，属于交往关系但不等于交往关系，它们之间是不可以替代的。

其次，交往也是一种实践活动。一方面，交往在人们最基本的实践即物质资料的生产活动中产生，是在人与自然的相互作用基础上产生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但另一方面，交往本身又是实践的对象和客体，人们正是通过社会实践不断地改造旧的交往形式，使交往合理化。这种改造往往是内在于交往之中的。从这种意义上，交往本身就是一种实践，而不是实践的一种派生关系。在交往实践中，人们不断以理想的交往形式改造和取代旧的交往形式，实现交往价值的历史转换，正如马克思所言：“为了不致丧失已经取得的成果，为了不致失掉文明的果实，人们在他们的交往方式不再适合于既得的生产力时，就不得不改变他们继承下来的一切社会形式。”因此，交往是一个主客观统一的过程。就前一方面而言，交往是客观的、合规律性的过程；就后一方面而言，交往又是一种属人的活动，其中蕴涵着人的价值取向和理想，因此，交往又是一种合目的性活动。在交往与实践的关系中，实践不等同于生产力，交往也不等同于生产关系，实践不仅仅是人与自然之间的相互作用，交往也不仅仅是伴随着人改造自然这种实践而产生的主体与主体之间的关系，人们对社会关系和交往关系的改造同样也属于实践，而且是一种对于人类社会发展来说非常重要的实践，因此马克思说：“社会——不管其形式如何——究竟是什么呢？是人们交互作用的产物。”

再次，交往与生产是辩证统一的。交往是生产过程中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作用，这种相互作用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二者辩证关系在实践中的应用。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把交往与生产看作是实践活动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并揭示了二者的内在关系。实践既是一种主客体之间的对象化活动，又是主体之间的交往活动。“生产力与交往形式的关系就是交往形式与个人的行动或活动的关系”，“而生产本身又是以个人彼此之间的交往[Verkehr]为前提的。这种交往的形式又是由生产决定的”。所以说，交往和生产互为存在前提，交往首先是人们在生产过程中的交往，是人存在的基本方式。物质生产决定交往的性质和形式，物质交往是物质生产得以进行和实现的前提。生产的发展程度决定着交往的范围与内容。随着生产的发展，交往最初由在家庭内部之间发生，然后扩展到城邦之间、各民族之间，随着生产与交往不断扩展，交往的内容也日益扩展，由物质交往发展到精神交往、政治交往等方面。交往对生产具有反作用。只有在普遍的交往中，个人才能摆脱民族、地域等条件的限制，同整个世界的生产建立起联系，才能使旧的生产关系解体，新的革命力量联合，从而加速新的生产关系建立。

最后，交往具有广泛的形式和重要的社会历史作用。对于交往形式，马克思从不同视角进行了规定：从交

往内容视角分为物质交往和精神交往，认为后者起初是前者的“直接产物”，尔后又成为前者的“必然升华物”；从主体的视角分为“个人交往”和“国家交往”或“民族交往”；从属性的视角分为经济交往、政治交往和文化交往等，认为战争也是一种特殊形式的交往；从交往地域范围的视角分为“区域交往”和“世界交往”。对于交往的社会历史作用，马克思主义认为，其一，交往是制度规范产生与发展的基础。交往活动产生于生产活动，生产活动和交往活动又必须借助于一定的规范才能进行，这就需要交往关系制度化。“在生产、交换和消费发展的一定阶段上，就会有一定的社会制度”，社会制度一旦形成，就规范着人们之间的交往。其二，交往影响一个民族的整体结构及与其他民族的相互关系，“各民族之间的相互关系取决于每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分工和内部交往的发展程度”“这个民族本身的整个内部结构也取决于自己的生产以及自己内部和外部的交往的发展程度”。其三，交往影响生产力的发展与提高。“某一个地域创造出来的生产力，特别是发明，在往后的发展中是否会失传，完全取决于交往扩展的情况”，因为“交往扩大了，工场手工业和整个生产运动有了巨大的发展”。其四，交往能够促进世界历史形成与全体人类解放，普遍交往，能够使“地域性的个人为世界历史性的、经验上普遍的个人所代替”。“交往的任何扩大都会消灭地域性的共产主义”。共产主义“是以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与此相联系的世界交往为前提的”。

理论的生命力在于能够照现实。当前我国正处于全面推进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历史时期，交往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影响重大。为此，我们应当全面深刻把握马克思主义交往理论，并以此为指导，在全球一体化的进程中实现与各种国际组织、不同国家和地区间的良性互动，在国内推进交往主体间自由、平等、健康的交往，确保我国现代化进程顺利进行。

